

周则范之死： 孙中山的湘西护法战略部署与失败

何文平 李银芳

【摘要】 孙中山在策划第二次护法运动的过程中，试图构建以西南地区为基础的联合攻桂阵线。湘西作为西南战略要冲且武力基础厚实，被视为联合西南对抗桂系的重要基地。孙中山利用民初以来革命党在湘西打下的基础，制定详细策略，组织湘西护法力量共同进攻桂系。由于谭延闿与桂系陆荣廷结盟，且与湘西周则范合作，孙中山的湘西战略布局大受干扰。困局中，湘西民党成员廖湘芸暗杀了周则范，一度为拥孙派合并湘西势力清除了障碍，但谭延闿的强势介入最终导致孙中山在湘西的攻桂战略部署失败。由此过程，可以看到民国初期利用地方军阀力量推动革命运动的复杂背景与脆弱性。

【关键词】 孙中山；湘西；护法运动；谭延闿；桂系

【中图分类号】 K2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769(2025)02-0186-11

在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中，西南诸省备受重视。^①在筹备第二次护法运动期间，孙中山认为“救国必先灭贼（按原函，上文有“桂贼不灭”，此处即指桂贼）而统一南方”^②，将桂系军阀视为救国之首要障碍，策划在滇、黔、川、湘、粤五省建立联合抗桂阵线。^③湘西因地处湖南西部，凭借其连接湘、鄂、川、黔四省的战略位置，成为孙中山策划第二次护法运动时的核心战略基地之一。护法战略的实施很大程度上依赖西南各地民军的广泛动员^④，孙中山选择湘西作为战略基地，也意图整合当地武装力量，为构建西南抗桂联盟奠定坚实基础。然而，当时湖南处于桂系陆荣廷的控制之下，陆又惯于借助其他力量^⑤，其与湖南谭延闿联手干预湘西，湘西地方军阀因之卷入各派的争夺之中，孙中山的湘西护法战略部署深受影响，终归失败。

【作者简介】 何文平，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银芳，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吉首大学讲师，广东 广州 510275。

① 段云章、邱捷：《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军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32页。

② 《批伍毓瑞函》，1919年11月10日，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61页。

③ 《致何民畏函》，1920年7月18日；《复谭延闿函》，1920年4月中旬，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86、255页。

④ 谢本书：《孙中山与西南军阀》，《云南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第54页。文中指出西南地区主要包括云南、广西、四川、贵州、广东和湖南六省区。

⑤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第1015页。

学界关于西南地区护法运动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滇黔军阀和桂系军阀等主要派系^①，对孙中山在湘西的战略部署关注不足。^②本文通过梳理当时报刊消息、孙中山与各方函电等史料，重建护法运动期间孙中山对湘西的关注与战略部署等基本史实，分析其所面临的挑战及陷入困境的原因，揭示民国初期利用地方军阀力量推动革命运动的复杂背景与脆弱性。

一、南北对峙中的湘西护法局势

湘西在联结滇黔与中原之战略通道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被视为大西南门户。近代湘西的战略地位显要，也跟其特别的武力传统分不开。嘉庆初年，为加强苗疆地区的军事防御和社会控制，清政府在湘西设立屯防，建立了一支约一万三千人的屯防兵勇队伍。道光年间，因应变局之需，湘西屯防兵勇被朝廷频繁征调“平乱”，参与到更为广泛的军事行动之中^③，由原先主要负责地方防守的“亦兵亦农”武装逐渐演变为朝廷征战的“职业化”军事力量。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湘西也是湘军、淮军的重要兵源地。^④远征征战，屯防兵勇积累了战功，其地位与社会影响随之大有改变。晚清全国裁汰绿营，镇筴绿营与绥靖镇绿营因善战得以留存。^⑤民国初年，袁世凯仍保留湘西的绿营和屯防，以应对湘西周边频繁出现的匪患。

经过晚清与民初的系列征战与整合，湘西的武装力量逐步演变为绿营、屯防勇丁与新军巡防军的融合体，并于民初形成了所谓的新“四大势力”，分别由湘西镇守使、辰沅道道尹、绥靖镇守使和湘西镇守副使所控制。^⑥1913年，熊希龄支持田家后裔田应诏成为湘西镇守使，掌握了包括绿营和屯防军在内的湘西核心军力。出生于沅州的张学济，与熊希龄关系密切，被熊推荐担任湖南监察使，1916年兼任辰沅道道尹，次年正式就职，掌握三千余人的军队，跻身于地方实力派人物之列。绥靖镇守使谢重光，举人出身，掌管千余名绿营兵力，尽管其实战能力有限，但在乱局中的湘西占有一席之地。1913年被任命为湘西镇守副使的陶忠洵，为北军旧部，也控制着一定的武装，后由周则范接替。到1916年，湘西田应诏、张学济、周则范及谢重光等护法军事力量约有一万一千余人。^⑦

辛亥革命时期，田兴恕之子、镇筴镇总兵周瑞龙的女婿、同盟会成员田应全，联合当地哥老会首领唐世钧等人组织光复军，推动湘西光复，成为新政权的核心成员。^⑧民国初年，袁世凯政权破坏了常德等地的革命机构，但湘西的革命活动依然活跃。^⑨孙中山派遣程潜与罗剑仇在上海会面，加强湘西的革命活动。罗剑仇以“湖南游击军”名义在湘西北部迅速扩大势力范围^⑩，于1916年初以护国军之名控制了湘西北部的永定、桑植、永顺等地。^⑪1917年罗剑仇遇刺。1918年湖南护法军第一军总司令林德轩进

① 代表性成果主要有陈长河的《孙中山在护法期间与陆荣廷的矛盾斗争》（《民国档案》2001年第1期）、汪朝光的《南北对峙中的护法运动——兼论护法时期的孙中山与西南地方实力派》（《史学月刊》2008年第1期）、段金生的《试论西南军阀地域范围流变（1916—1927）》（《史林》2015年第4期）等。关于孙中山与湘系军阀谭延闿、赵恒惕等的关系演变，可以参考路晨晖的《谭延闿与孙中山的关系探讨——基于〈谭延闿日记〉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湘潭大学，2017年）、谷小水的《二次护法时期赵恒惕与广东政府关系述论》（《广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等论文。

② 杨学东在《论湘南、湘西两路护法军》一文中，从首次护法战争的战况角度分析了湘西护法军的关键作用，侧重于论述孙中山希望湘西护法军支援湖北战场的情形，未深入讨论当时的攻桂战略部署。杨学东：《论湘南、湘西两路护法军》，《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

③ 光绪《凤凰厅续志》卷6“兵防志·剿抚2”，江苏古籍出版社编选：《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第79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74—478页。

④ 谢晓辉：《傅鼎练兵成法与镇筴兵勇的兴起：清代地方军事制度变革之肇始》，《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1期，第12页。

⑤ 罗尔纲：《绿营兵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10页。

⑥ 清末，湘西镇筴有“三大家”军阀势力，分别为田家、沈家和熊家。参见金介甫：《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符家钦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年，第61页。

⑦ 毛振发：《护法战争史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77页。

⑧ 凤凰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凤凰县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27、363页。

⑨ 何文平：《孙中山史事编年》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986—1987页。

⑩ 《湘省战祸之未已》，《申报》1916年7月29日，第7版。

⑪ 《林德轩上总理函》，1916年4月16日，环龙路档案第04418号，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馆档案馆藏。

驻大庸县,根据孙中山的指示,控制了湘西北部多个县份,将其发展为革命派的战略要地,孙中山的革命影响在该地区得以延续。

民国初年,湘西在南北之争中局势混乱,匪势猖獗。田应诏与张学济在时任湘西宣慰使熊希龄的默许下采取中立政策,一面剿匪维稳,一面积聚力量,避免直接卷入南北冲突。然而,护法运动爆发后,湘西成为各派争夺的战场。1917年底至1918年初,北洋军阀两次进攻湖南,由北洋政府任命的湖南督军傅良佐试图以剿匪之名控制湘西,引发湘西军阀的强烈反抗,田应诏和张学济由中立转向支持南方护法军,积极抗击北洋势力的扩张。^①

1918年1月,北洋军进攻湖北荆州和襄阳,川滇黔靖国联军在唐继尧的指挥下忙于平定四川内乱,无力援助,湘粤桂护国联军总司令谭浩明也未能有效响应。紧要关头,孙中山以援助荆襄重任赋予湘西力量,委任张学济为湘西护法军总司令,并派遣秘书李建中担任湘西劳军使,负责协调当地军事力量。孙中山向张学济、田应诏、周则范与林德轩等人发出指令,强调湘西战略的重要性及对湖北援助的必要性,指出“惟当此一发千钧之际”,“督率湘西健儿,一致出师援鄂,扼武汉以控幽燕,则长江流域,不崇朝而定。大局问题,亦易解决也。”^②

孙中山的战略部署突出了湘西在南北政局中的地位。湘西各军明白,荆襄一旦失守,湘西将面临“唇亡齿寒”的境地^③,因此迅速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张学济在沅陵宣布起义,正式就任湘西护法军总司令,田应诏和周则范也宣布起义,三方联合集结一万六千兵力^④,迅速向湖北石首和公安地区推进,力图削弱北洋军力,守护荆襄战线。

谭浩明意图通过控制湘西援鄂军来扩大其在湖南的影响力,任命李书城为湘西防务督办^⑤,并提拔其为湘西援鄂军第一路总司令,同时任命田应诏和周则范为第二、第三路总司令。^⑥此举直接边缘化了孙中山任命的湘西护法军总司令张学济,导致湘西援鄂军的指挥体系出现混乱。在与北洋军的对抗中,湘西军队因此溃败。张学济被迫撤退至辰州,田应诏与周则范撤至常德。

1918年3月,随着岳阳和长沙相继被北方军阀控制,常德“顿形突出之势”,成为前线重镇。谭浩明抓住北军张敬尧派重兵进攻常德的时机,迅速派遣桂军第二司令林俊亭入驻常德,加强对湘西各军的控制。其时,田应诏部、胡瑛部和周则范部共约一万二千余人驻守常德,面对北洋军的进攻,力显薄弱。^⑦林俊亭抵达后,立即采取措施限制湘西军队的征税和筹款权利,意图吞并湘西武装,扩张自身势力,导致湘西军陷入“进无门,而退无路”的困境。^⑧面对此种局势,湖南参议员田永正迅速向孙中山报告了常德的危急情况,建议孙中山介入,促进湘西与黔军的合作,防止谭浩明“猖獗于湖南”。^⑨

孙中山因军政府改组问题与桂系已产生严重分歧,在了解到桂系援湘的真实意图后,为稳固湘西局势,1918年4月,孙中山向唐继尧提议任命田应诏和周则范分别担任湘南靖国军第一军和第二军总司令。^⑩针对湘西军队在常德的孤立无援和财政困窘,孙中山希望地方革命力量能“筹款接济”。这些举

①《湘南战祸中之鄂闻》,《申报》1917年10月25日,第7版。

②《致张溶川等电》,1918年1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94—295页。

③《湘城军事谈(长沙通信)》,《申报》1918年2月21日,第6版。

④杨思义:《护法时期的湘西动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合编本第4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4页。毛振发在《护法战争史略》中提及,湘西护法军田应诏、周则范、张学济三方势力共计一万一千余人,实际上,这三方军事实力在起义时通过收编进行了扩充。(见该书第77页。)

⑤《进攻荆襄声中之鄂局》,《申报》1918年1月19日,第6版。

⑥《湘城军事谈(长沙通信)》。

⑦毛振发:《护法战争史略》,第78页。

⑧《湘鄂战局之近况》,《申报》1918年3月13日,第6版。

⑨《田永正上总理函》,1918年3月22日,环龙路档案第04523号,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藏,转引自张文苑、谷小水:《孙中山史事编年》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2996—2997页。

⑩《孙文为商请任命田应诏、周则范为湘南靖国军第一、二军总司令致唐继尧的密电》,1918年4月12日,云南省档案馆编:《云南档案史料》第1期,1988年,第61页。

动旨在促进湘西各军“倾向军府”。^①

在孙中山策略的推动下，唐继尧和刘显世指派黔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卢焘和游击司令王华裔率部进驻辰州和洪江，加强湘西防御。^②田应诏被任命为湘西靖国军第一军军长，张学济为第二军军长，胡瑛、谢重光、林德轩分别担任第三、第四与第五军的军长。湘西靖国军五军格局的确立，提升了其在南北政治格局中的战略地位。周则范因与谭浩明关系密切，未加入靖国军体系，而是继续使用“护法军”称号，自封为“湘西护法军总司令”。^③对此，孙中山批评道，“近时号称护法诸军，其名称虽极正大，实则皆为权利之争”。^④

随后，根据段祺瑞的命令，北洋政府派遣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进驻常德。但由于与段祺瑞的矛盾，冯玉祥宣布中立^⑤，并与田应诏、周则范达成协议，促使田、周撤出常德。此一变动重塑了湘西的军事格局，冯玉祥驻守辰州，黔军卢焘、王华裔分驻辰州、洪江，形成相互制衡局面。

田应诏和张学济为应对复杂局势，成立“湘西军民两政会议处”，旨在统一湘西军民两政，减少外部干预。会议处由覃振、平刚、田应诏、张学济、胡瑛、谢重光、林德轩、杨思义等八位评议员组成，负责湘西的各项重大事务；还设立了军政处和民政处，由田应诏担任军政长，张学济担任民政长，意在强化湘西的军事与行政统筹。^⑥

于是，湘西地区形成了外来黔军、北洋军，田应诏和张学济领导的靖国军，以及周则范领导的护法军共存的复杂军事格局。田应诏控制凤凰、乾城、麻阳、泸溪等湘西中心地区，这些地方是清代湘西绿营和屯兵的主要驻守地，也是湘西的军事和政治中心。张学济控制了沅水流域的沅陵、保靖、永顺、古丈等县，沅水作为连接西南与中原的重要水路，在经济和战略上都具有重要意义。谢重光的势力则以永绥为中心，辐射至龙山等县。永绥在清代是苗疆三厅之一，亦是湘西军事和屯务重镇。胡瑛掌控辰溪、泸溪等地区。林德轩的部队主要分布于湘西北部的桑植、永顺、保靖、龙山等地，代表着孙中山在湘西的影响力。在五大靖国军力量中，田应诏与张学济势力最强，其总司令部均设于战略要地辰州。^⑦辰州位于湘西的沅水流域，是云贵通往常德的关键通道，对西南防御极为重要。

周则范则以洪江和溆浦为军事据点，控制沅水以南的溆浦、辰溪、通道、会同、绥宁等地^⑧，其部有四个梯团，分别由蔡钜猷、刘叙彝、杨玉生及廖湘芸指挥。洪江作为滇黔鸦片运输的主要通道，为其军队提供了丰厚的鸦片税收。

在湘西的两派护法力量之中，无论是靖国军还是护法军，均有中华革命党成员的参与。覃振任湘西军民两政会议处评议员，林德轩任湘西靖国军第五军军长。林德轩和田应诏有同学及同袍之谊。周则范部第四梯团团长廖湘芸，最初由孙中山任命为湖南护法军游击总司令，后在周控制的安化地区组织了约一千人的部队。虽没有直接证据显示这一行动由孙中山直接策划，但廖部无疑对周则范的势力构成了一定的制衡。周则范主动与廖湘芸合作，似有应对潜在威胁的考量。在鄂州救援战中，廖湘芸部队实力大增，缴获了千余支枪械，成为周则范手下四支力量中势力最为强大的一支。^⑨

①《致覃振电》，1918年3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370页。

②毛振发：《护法战争史略》，第78页。

③杨思义：《护法时期的湘西动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合编本第4集，第130页。

④《复廖湘芸函》，1919年6月29日，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75—76页。

⑤《潇湘军事要讯（长沙通信）》，《申报》1918年7月28日，第6版。

⑥杨思义：《护法时期的湘西动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合编本第4集，第129页。

⑦《湘西南军之内容》，《顺天时报》1919年12月11日，第4版。

⑧《湘西南军之内容》。

⑨萧石朋：《廖湘芸烟溪起事纪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合编本第4集，第137页。

二、孙中山的期待与周则范之死

经历首次护法战争失败后，孙中山意识到桂系已成革命之障碍，将讨伐桂系作为首要任务。孙中山筹谋联合滇黔川湘粤五地，“先灭桂贼，以统一南方”，进而“出师北上，力争中原”。^①为此，孙中山与革命党积极寻求与西南民军革命势力的合作。^②湘西成为构建攻桂战线的关键环节。孙中山复函田应诏指出，若湘西各军“秉承筹策”，则“有指臂之效”。^③孙中山寄望湘西护法力量“与闽中同志同时并进，湘则南入柳、桂，闽则西略潮、惠，而桂、粤内部亦同时起，则桂贼可一朝扑灭也”。^④

孙中山期盼湘西护法力量团结一心，但由于各派政治势力的渗透，湘西护法各军之间存在矛盾甚至对立。周则范与张学济之间隙由来已久，矛盾尤为突出。早在1916年，湘西镇守副使陶忠洵辞职后，时为辰沅道尹的张学济，向熊希龄表达“意愿就武职”。熊希龄与张学济关系深厚，对周则范持批评态度。因此，熊向谭延闿建议，“容川性质近于军事，不宜再兼道尹”。^⑤同时，熊告诫谭延闿，周则范“此等小人，往往希荣好事，不顾大局”，为“害群之马”。^⑥熊希龄明确反对，谭延闿婉转回应。最终在1916年10月，周则范被提升为湘西镇守副使。周、张因争夺湘西镇守副使职位结下怨恨。

周虽与田、张关系并不融洽，且为熊希龄所不喜，但在谭延闿的庇护下，周在湘西迅速稳固了自己的地位，并不断扩大势力。1918年，周则范向永绥茶洞副将宋海涛伸出援手，助其驱离了谢重光。谢退往云南，淡出湘西的军政核心。此后，宋海涛控制了永绥、保靖、永顺和龙山，并掌管绥、保两县的屯务。因宋海涛投向了周则范，周的势力从湘西西南部扩张到北部，形成了与田应诏相匹敌的军事局面。二者“既各欲扩张其势力，乃勃然生吞并之心”，皆存吞并彼此的野心。^⑦

在湘西的护法军事力量中，周则范不仅与湘西靖国军对立，而且由于政见分歧，与其部下第四梯团团长廖湘芸的关系也持续紧张。孙中山对廖湘芸在湘西地区的经营曾表示赞许，对其“以孤军奋起，辛苦支持，至今日而蔚成劲旅”深感欣慰，并鼓励其“益加训练淬厉，以为国用”。^⑧孙中山希望湘西各军“能念唇齿相依之谊，推诚联合，成一大团体”。^⑨为此，孙中山曾致函周则范，寄望其与廖湘芸团结一致，“坚持不挠，克竟伟绩，以戡定国难，为民造福”。^⑩但周则范似不为所动，未与廖湘芸达成有效的合作。

在孙中山看来，西南联合攻桂战线中，湖南处于关键的中间位置^⑪，志在必得，但这一计划遭遇谭延闿的阻挠。1919年初，孙中山任命程潜为湘军总司令，驻扎郴州。而桂系的陆荣廷支持谭延闿出任湖南督军，驻地永州。由此，湘南形成了程潜与谭延闿二元对峙的局面，各自控制一方，背后依赖不同

①《复伍毓瑞函》，1919年11月11日，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63页。

②谢本书：《孙中山与西南军阀》，第54页。

③《复田应诏函》，1919年10月18日，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49页。

④《批林德轩函》，1919年9月21日，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16—117页。

⑤《为湘西善后诸事致谭延闿函》，1916年9月14日，周秋光编：《熊希龄集》第5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96页。

⑥《为周则范挑拨湘军界事致长沙谭督军电》，1916年9月25日，周秋光编：《熊希龄集》第5册，第610页。

⑦《湘中南军之危机》，《申报》1920年1月15日，第7版。

⑧《复廖湘芸函》，1919年6月29日，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75—76页。

⑨《复林德轩函》，1919年10月，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59页。

⑩《致周蔗增函》，1919年6月29日，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76页。

⑪《复谭延闿函》，1920年4月中旬，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55页。

的政治势力。当时湖南局势并不利于谭延闿，省城长沙被皖系张敬尧控制，衡阳则为直系吴佩孚占据。谭延闿仅实际掌控永州一带的湘南地区。作为湘系军阀代表，谭延闿和赵恒惕军事实力较弱，主要依靠政治投机，“或附南，或附北，借重外力以自存”。^①

为了重掌湖南的军政权力，谭延闿与桂系陆荣廷结盟，重建湘桂战线，并利用直系和皖系间的矛盾，促成桂系陆荣廷与直系吴佩孚合作，签署《救国同盟军草约》。^②1919年，借助陆鸿逵事件，谭延闿迫使程潜离开湖南，成为湘南湘军的唯一统帅。随后，谭延闿计划攻占长沙，驱逐张敬尧，并将目标指向湘西。

谭延闿与陆荣廷的联盟行动引起了孙中山的关注。1919年，南北军阀议和，陆荣廷提出“取消国会、军政府，单独投降”^③，直接违背了孙中山坚持以宪法和恢复国会为首要会议条件的政策。^④谭延闿支持陆荣廷的提议，并希望将督湘的职务纳入和谈条件中^⑤，试图通过谈判实现其掌控湖南的目标。若谭延闿成为湘督，湘西将可能落入其与陆荣廷控制之下。在此形势下，林德轩向孙中山发出紧急电报，指出“我湘西一部分，于西南地位上，几成瓯脱，殊为可虑”，建议孙中山在和谈中提出由田应诏主政湘西，“以保吾党之实力，而维系人心”。孙中山积极回应，赞同由田应诏主政湘西。^⑥显然，林德轩的策略旨在确保孙中山对湘西地区的掌控，防止其落入谭延闿和陆荣廷的势力范围。

同时，针对谭延闿对湘西的野心，林德轩主张驱逐“伪革命”谭延闿势在必行，并与田应诏、张学济等人计划在和议破裂之时攻占常德。^⑦对于林之驱谭计划，孙中山没有给出直接回应，而是将焦点转向了当时的首要敌手桂系，明确表示：“吾党今日欲有发展，非先平桂贼不可。”“如湘西将士，欲为国造福、巩固共和者，必当先联络一气”^⑧，希望田应诏“与川中各同志联为一气，互相扶助”，“一旦有事，即可左提右挈，一致进行”^⑨，“将来肃清内顾，奠定中原，实以湘西为基础”。^⑩显然，孙中山从整合力量、重塑共和的宏愿出发，比民党的湘西驱谭策略更有远见。^⑪然而，随后谭延闿在郴州遭遇刺杀，“虽未受伤，然虚惊必已不少”的传闻出现。^⑫

周则范作为谭延闿的政治盟友，在湖南问题上积极支持谭延闿，并发电公开为谭延闿督湘呼号。^⑬事实上，谭延闿与周则范早有秘密协议，承诺在获得周的支持后增强其在湘西的军权。^⑭谭延闿与周则范之间的合作基于两个重要因素。其一，谭延闿曾与陶忠洵有过从属关系，周则范乃陶的得力部下，此

① 段云章、邱捷：《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军阀》，第205页。

② 路晨晖：《谭延闿与孙中山的关系探讨——基于〈谭延闿日记〉的研究》，第8页。

③ 《致刘显世电》，1920年2月27日，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17页。

④ 陈正卿：《1919年“南北议和”前后的陆荣廷》，《陆荣廷新论》编委会编：《陆荣廷新论》，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552页。

⑤ 《对湘督问题发表意见之通电》，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66—367页。

⑥ 《林德轩报告湘西军情并推荐田应诏上总理函》，黄季陆编：《革命文献》第48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年，第270页。

⑦ 《林德轩上总理函》，1919年9月21日，环龙路档案第04490号，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藏，转引自张文苑、谷小水：《孙中山史事编年》第6卷，第3505页。

⑧ 《批林德轩函》，1919年9月21日，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16—117页。

⑨ 《复田应诏函》，1919年10月18日，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49页。

⑩ 《致田应诏函》，1919年11月11日，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62页。

⑪ 张文苑、谷小水：《孙中山史事编年》第6卷，第3505页。

⑫ 《周则范被刺之余波》，《申报》1919年12月7日，第7版。

⑬ 《粤闻纪要》，《申报》1918年12月29日，第7版。

⑭ 杨思义：《护法时期的湘西动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合编本第4集，第130页。

层关系为谭与周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奠定了基础。其二，谭延闿与周则范在湘西的战略目标上高度一致，即削弱田应诏和张学济领导的湘西靖国军，以扩张其势力。

周则范不仅公开支持谭延闿成为湖南总司令，还表达了清除湘西反谭势力的决心。廖湘芸觉察到“大局日趋危险”，派遣参谋长潘康时赴沪向孙中山请示对策。^①9月19日，孙中山回信廖，强调“今日国事虽至为艰危，然吾党同志如能努力进行，坚持不懈，则扫除障碍，建设真正民治，为事亦非甚难，但在决心为之耳”，建议执行“盛华林之计划”。^②信中虽未直接指示廖湘芸对周则范采取何种具体行动，但其措辞鼓励廖湘芸当有所为，也应当有决心。

11月11日，廖湘芸密令发动暗杀行动。其行动有二，一是命令连长张荣发暗杀周则范，二是指派炮兵连长谭德青袭杀周则范部第三梯团团长杨玉生。行动果断且成功。杨玉生在前往团部用早餐的路上，被谭德青击毙。张荣发深夜潜入周则范卧室，将其杀死。周则范余部大乱，并没有进行有效的抵抗。^③廖湘芸随后发布电文，宣布与周则范的关系早已终止，指控周则范与杨玉生企图以“秉承中央各问题”为名，迫使其改编军队，同时声明将致力于稳固正常秩序，并遵从军政府的调遣。^④

关于周则范之死，当时流传着多种猜测。一种观点认为廖湘芸为索要欠饷而杀周，另一种说法是，周则范与廖湘芸因分别与北方通款而产生互不信任和猜忌导致了这一结果。^⑤还有分析认为，这是张学济和田应诏为统一湘西所策划的。^⑥然而，也有证据似乎表明孙中山与此事有所关联。1919年11月30日给周震麟的信中，孙中山表示，“近据湘西各同志函电，皆谓周（则范）附合桂系，意图牺牲国会，分赃乞和，且将不利于湘西，故其部下杀之有辞”，若周则范之死能帮助廖湘芸的军队“得成劲旅”并“树吾党之声援”，或为“一举而两全之计”。^⑦1920年6月，孙中山在给廖湘芸的信中明确指示，应公开宣称诛杀周则范是“奉文命令”。^⑧无论如何，孙中山的态度为廖湘芸的谋杀行动提供了一定的正当性，并以之帮助廖争取更多的革命支持力量。

正如孙中山所希冀的，廖湘芸行动后，许多革命者纷纷表示了支持。1919年11月19日，覃振在给孙中山的电文中盛赞廖湘芸“宗旨纯正，义勇过人”。^⑨其时在湘南策划湘西靖国军援粤攻桂的林修梅也表示：“湘军护法份子已非昔比，湘芸西起，亦是一线生机”。林修梅并赞誉廖湘芸遵循孙中山的建议，带领军队“仿行屯田办法，令士兵自种蔬菜”，为革命的典范。^⑩孙中山迅速回复，激励林修梅“当赶紧预备，与湘西一致动作”。^⑪

三、谭延闿干预与湘西护法部署的失败

周则范死后，孙中山认为湘西形势“日臻美满”，表示欣慰有加，视其为西南联合攻打桂系的有利

①《廖湘芸上总理函》，1919年9月19日，环龙路档案第04374号，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藏，转引自张文苑、谷小水：《孙中山史事编年》第6卷，第3477页。

②《复廖湘芸函》，1919年9月19日，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13—114页。

③萧石朋：《廖湘芸烟溪起事纪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合编本第4集，第138页。

④《溆浦廖湘芸等致南方通电》，《申报》1919年11月20日，第6版。

⑤《湘西周则范被刺详情》，《申报》1919年11月30日，第7版。

⑥《湘中南军之危机》。

⑦《复周震麟函》，1919年11月30日，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70页。

⑧《致廖湘芸函》，1920年6月上旬，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71页。

⑨《覃振、林祖涵致孙中山电》，1919年11月19日，谷小水编：《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第5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85页。

⑩《林修梅上总理函》，1919年12月13日，环龙路档案第04492号，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藏。程潜被谭延闿逼迫出走湘南后，孙中山任命林修梅接任湘南总司令职位。转引自张文苑、谷小水：《孙中山史事编年》第6卷，第3527页。

⑪《批林修梅函》，1919年12月27日，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78页。

突破口，计划待“湘西统一就绪”后立即推行此战略。^①

然而，陆荣廷为确保在西南的战略利益，迅速发起了一系列军事行动。1920年2月，陆荣廷在永州部署兵力，并派代表前往贵阳与刘显世接洽，旨在重新整合湘西靖国军。陆荣廷还与谭延闿达成战略合作，促使谭延闿直接介入湘西事务，实现湘西统一。陆荣廷的举动旨在防止湘西靖国军进攻桂林，破坏孙中山构建的西南联合攻桂战线。当时传言，陆荣廷企图通过控制湘西来制黔，挟湘南以制滇，并以川中熊克武之乱牵制滇黔，其野心在于解体西南，实现粤桂统一。^②对此，孙中山批判陆荣廷“狼子野心，志不在小”^③，提醒湘西各军保持警惕，“勿为所诱”。^④

谭延闿随即采取行动，支持周则范的余部蔡钺猷和刘叙彝两位梯团长公开对抗廖湘芸，表面上是为周复仇，实则是牵制廖湘芸的兵力，增加孙中山在湘西的战略压力。谭延闿将蔡钺猷的第二梯团、刘叙彝的第一梯团的部分队伍和周则范参谋长田镇藩的残部，合计约两千人，重组为湖南第五区守备队，驻守在洪江，任命蔡钺猷为司令，并秘密策划对廖湘芸的进攻。^⑤面对谭延闿的进逼，廖湘芸“一面通电反对谓将相见以兵，一面整饬所部，预备战争”。^⑥孙中山也尝试寻找外部盟友，为廖湘芸提供支持，同时积极支持田应诏和张学济推进湘西独立进程。

随后，双方在安江爆发大冲突，廖湘芸与蔡、刘之部激战五天五夜。起初，蔡和刘因兵力不足处于劣势，为寻求转机，他们一面向辰州求援，一面寻求驻洪黔军游击司令王华裔的支持，并在安江两岸设立伏兵。黔军王华裔介入，战局逆转，廖湘芸在安江遭遇伏击，全军溃败。^⑦事实上，谭延闿这一系列举措的目的是“恢复其原有势力而已”。^⑧

田应诏和张学济并未出兵支援廖湘芸，而是以湘西参议会的名义，请求辰州的黔军旅长卢焘和洪江的黔军游击司令王华裔调停蔡、廖的冲突，以维持湘西秩序。^⑨孙中山对于田应诏和张学济这种敷衍之举非常不满，质问道：“近日湘芸败，田、张等何以不助力？”^⑩

廖湘芸在安江战败后撤退到溆浦，后又撤至底庄和烟溪一带。遵循孙中山的建议，廖与驻扎在新化的张敬尧部旅长杨缵绪联合发起对溆浦的反攻。蔡钺猷和刘叙彝提前于溆浦前线各地“节节设防，严行戒备”，“故廖军一经发动，即被侦知”。^⑪2月，遭遇连续失败的廖湘芸从湘西返回上海，途经长沙时，拜访了正遭湘桂直联盟驱逐而陷入困境的张敬尧。张敬尧向孙中山表达了投诚意愿，承诺“如得先生命令”，“攻桂一节”，“甘效驰驱”。^⑫孙中山秉承“凡与吾共敌者应引为友”的原则^⑬，对张敬尧的投诚表示接纳并欢迎。

①《复林德轩函》，1920年1月，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14页。

②《公电：辰州田应诏等通电》，《申报》1920年2月5日，第3版。

③《致刘显世电》，1920年2月27日，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17页。

④《致唐继尧电》，1920年3月下旬，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243页。

⑤《湘西战后之所闻》，《申报》1920年2月5日，第7版。

⑥《周则范被杀后之新波澜》，《申报》1919年12月19日，第7版。

⑦杨思义：《护法时期的湘西动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合编本第4集，第133—134页；《湘西战后之所闻》。

⑧《湘西战事形势危急》，《益世报》1920年2月27日，第6版。

⑨《湘中南军风波又起》，《申报》1920年2月6日，第7版。

⑩《批杨熙绩函》，1919年12月30日，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79页。

⑪《湘西又将有变化》，《申报》1920年2月25日，第7版。

⑫《刘焕葵上总理函》，1920年2月28日，环龙路档案第04338号，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馆档案馆藏，转引自谷小水：《孙中山史事编年》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3554页。

⑬《致林修梅函》，1919年，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97页。

孙中山对廖湘芸的支持坚定不移，期望廖能够“重张旗鼓、复出洪、淑，以收永、桂”。孙中山并指示驻扎在湘西的护法军和黔军的将领们协助廖湘芸，“凡遇廖军到处，即希妥为接洽，并望协同动作”。^①廖湘芸得到孙中山明确支持后，决定暂缓赴沪。3月13日，张敬尧向孙中山报告了廖湘芸更改行程的决定，孙中山表示欣慰，“未暇来沪，想系图谋进行”，并嘱咐廖与张敬尧“切实计划，并随时将进行情形电沪”。^②然而，在廖湘芸与桂系军队交战时，由于武器弹药短缺，“连日不利”，“不能再振”。孙中山紧急致电张敬尧，请求提供军事援助，强调“倘湘芸竟至一蹶不起，则足下之地位，亦必难保”，“为利害计，务望足下力予接济，俾湘芸械弹不缺，以竟前功，早进桂境，以引起两广之内应，则山贼可扑灭也。”^③

同时，孙中山密切联系田应诏和张学济，敦促其迅速行动以统一湘西军政。孙中山强调“周氏被戮，为发展进行大好时机”，催促田、张“合力共作”，统一编制，实现湘西军政统一。^④遵循孙中山的指示，田应诏和张学济以“湘西军政若再分歧，对内则分散不足以资整顿，对外则薄弱不足以谋抵御”为名，在12月初召开辰州军事会议，商议军政统一办法，要求“各军各派代表一人”参加会议。会议上，田应诏被选为湘西军政长，负责改编和整顿湘西各军队，统一饷项支配，并规划各军分担防守任务，以确保湘西与湘南互不相统属。^⑤

谭延闿坚持湘省军民政事应归南军统一管理，田、张则坚称“凡属湘西区域，皆不许有外力搀入其间”。^⑥谭延闿在尝试通过熊希龄调解未果后^⑦，指派杨畬为湘西民政长，安排其入驻洪江，负责洪江及周边地区的民政事务。此举遭到田、张的强烈反对，二人通过湘西临时参议会对外发表联合声明，明确拒绝承认对杨畬的任命。^⑧

谭延闿随即把目标锁定在辰州，计划武力统一湘西。在蔡钜猷与廖湘芸达成停战协议的背景下，谭以湖南军政府名义宣布廖湘芸为叛逆，并指控其谋害上级长官，对其进行讨伐。^⑨随后，谭延闿派遣大规模军队进驻洪江，总兵力超过四万。相比之下，辰州方面的兵力仅有八千余人。谭延闿在辰州对峙中处于明显的优势。^⑩

熊希龄试图进行调解，电告谭延闿“目前大局纷扰，南与南争，北与北争，势必大溃。吾湘不可再有破裂”，建议“对于湘西宜主放任”。^⑪然谭延闿坚持统一湘西。因兵力差异明显，田应诏和张学济不得不与谭延闿和谈。双方达成协议，湘西民政归谭延闿主持，而军政继续由田、张掌控。此外，为了确保双方在政治与军事上的均衡，田、张推荐林德轩出任湘西镇守副使。^⑫但谭随后以军费短缺为名，派遣财政清理员前往湘西，准备变卖湘西各县的官产以筹措军需，并下令湘西各道尹、知事必须执行此命令。同时，谭派遣一系列官员进入湘西，包括实业调查员、警政考察员、学务视察员等。这些举措表明，谭延闿意在彻底清理湘西地方资产，将田、张等人完全架空。对此，张学济表示强烈反对，并召集

①《致刘显世电》，1920年2月27日，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17页。

②《致廖湘芸电》，1920年3月17日，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30页；谷小水：《孙中山史事编年》第7卷，第3560页。

③《致张敬尧电》，1920年4月1日，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45页。

④张文苑、谷小水：《孙中山史事编年》第6卷，第3515页。

⑤《湘西统一军政之会议》，《民国日报》（上海）1920年1月11日，第6版。

⑥《湘西又将有变化》。

⑦《为田、张两部争执事致熊希龄电》，1920年1月15日，周秋光主编：《谭延闿集》第2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87页。

⑧《湘西临时参议会通电》，《申报》1920年1月3日，第6版。

⑨《查办廖湘芸结果》，《大公报》（天津）1920年3月16日，第2张。

⑩《谭延闿进攻冯玉祥》，《晨报》1920年3月19日，第3版。

⑪《致电熊希龄请告田、张勿信谣言》，1920年5月3日，周秋光主编：《谭延闿集》第2卷，第589页。

⑫《湘中之南北军事谈》，《申报》1920年3月12日，第7版。

湘西各地要人商讨对策，武力反抗。^①地方革命派表示“谭延闿不除，吾党之目的难达”，“倒谭即伐陆之先声，吾湘西绝不与吾党主义相悖。”^②与此同时，谭延闿在郴州召开军事会议，做好了一切进攻准备^③，双方大战一触即发。

由于亲桂的熊克武被川、滇、黔各军击败，川中军事局势逐渐稳定。川事平定意味着桂系的右臂已断，陆荣廷面临着滇桂关系完全破裂，在西南地区陷入孤立之境，讨桂形势呈现出大好局面。孙中山联合各方力量，决定全面进攻桂系。1920年6月初，孙中山下令廖湘芸进攻桂林，彻底消灭桂系势力。6月5日，孙中山在给张学济的信中透露了讨桂计划及各方战略进展，鼓励张学济“秣马厉兵，以待大举”。^④孙中山还努力争取谭延闿的支持，多次致函劝其讨桂，但谭不为所动。

当时湘西的军事形势并不乐观。廖湘芸虽得张敬尧协助，但处境“仍形危殆”。5月，谭延闿发表长文悼念周则范，严厉指责廖湘芸，称其“蛇蝎居心，豺虎不食，比匪为殃，忘恩犯上”^⑤，此举给廖湘芸带来了巨大的舆论压力。廖湘芸向孙中山电告了所面临的困境，寻求进一步的指示。孙中山为廖湘芸出征伐桂提供了几条具体意见：第一，与辰州的军队保持紧密联系，对洪江与溆浦的军队进行仔细甄别，保留可以为我方所用者，将其他部队迅速淘汰；第二，尽快结束与周则范残部蔡、刘的纷争，以免重蹈安江之败；第三，张敬尧是可靠盟友，与之全力合作；第四，出征前公开声明诛杀周则范及与张敬尧合作“均系奉文命令”，如此“可以间执谗慝之口”。^⑥

为了确保行动顺利进行，孙中山特意给张敬尧发去电报，明确表示廖湘芸出征是遵其指令。电文中强调：“湘芸此次出师，唯一之任务，以奉文命令，直扑广西，对内对外一切名义，文可负完全责任，决不予人以口实，使督军为难。”^⑦然而，局势并未如预期发展。在张敬尧尚未出兵援廖前，谭延闿已迫使其败出长沙，退往岳州。同时，廖湘芸在湘西的局势未能出现大的改观，最终败退离开湘西。

7月22日，谭延闿在驱逐张敬尧后成功控制湖南政权，开启了第三次督湘任期。谭延闿宣布湖南实行自治，强调独立自主，不受外部势力干预。^⑧此外，谭延闿提倡“粤人治粤”，致电西南地区各要人，试图调和粤桂之间的纷争。^⑨

在此期间，谭延闿与田应诏达成协议，维持田应诏的湘西镇守使职位，并召请其到长沙设立行署。这一策略性布局瓦解了田应诏与张学济联盟。7月，田应诏发表退隐声明，湘西的军政权力由陈渠珍接管。7月27日，湘西临时参议会自请撤销而解散。^⑩冯玉祥也在谭延闿的压力下撤离湘西。不久后，张学济的部队因不敌谭延闿部而溃散^⑪，蔡钜猷趁机出兵，迫使张学济败退至四川。在撤退来凤城途中，张学济遭“神兵”杀害，余部则被蔡钜猷吸收。蔡钜猷随后担任湘西镇守副使^⑫，与陈渠珍一起成为湘西新的两大势力。9月，谭延闿拨划二万元专款为周则范营葬，在省城举办追悼会，以表哀悼。^⑬

10月，孙中山在粤桂战争期间努力联合滇、黔、湘三地军力对桂林发起攻势，旨在以桂军主力被

①《湘西南之争潮复起》，《申报》1920年4月19日，第7版。

②《杨熙绩上总理函》，1919年12月30日，环龙路档案第04356号，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藏，转引自张文苑、谷小水：《孙中山史事编年》第6卷，第3529页。

③《专电：北京电 冯玉祥电》，《申报》1920年6月3日，第3版。

④《致张学济函》，1920年6月5日，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69页。

⑤《追悼湘西护国军周故总司令则范暨杨司令玉生公启》，《申报》1920年5月21日，第1版。

⑥《致廖湘芸函》，1920年6月上旬，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71页。

⑦《致张敬尧函》，1920年6月上旬，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71页。

⑧《湘军将领谭延闿等致孙中山等电》，1920年11月2日，谷小水编：《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第5卷，第475页。

⑨《谭延闿主张粤人治粤》，《民国日报》（上海）1920年9月14日，第3版。

⑩《湘西参议会自请撤销》，《民国日报》（上海）1920年7月27日，第7版。

⑪《湘西战剧行将重演》，《申报》1920年11月17日，第7版。

⑫《湘西军界之变迁》，《大公报》（天津）1920年10月7日，第2张。

⑬《周则范》，《益世报》（天津）1920年9月22日，第7版。

广东战事牵制为契机，迫使桂系军队陷入双线作战的被动境地。为达成此目标，孙中山多次致电谭延闿、赵恒惕以及田应诏等人，希望其进攻广西，但均未能获得积极响应。

此时，在湘西，原常澧镇守使王正雅被副镇守使卿衡暗杀，其子王育寅为父报仇而起兵，控制了大庸和慈利地区。对此，谭延闿进行了公开谴责。面对压力，王育寅声称为了援粤攻桂而归附孙中山，并推举林修梅为湘西靖国军总司令。^①王和林共同组建湘西靖国军，并发布讨伐桂系的电令，准备出师攻桂。孙中山将这力量改编为讨桂军，期望其统一湘西，以待机攻桂。同时，时为湘西镇守副使的蔡钜猷亦向孙中山表达了救国之决心，孙中山表示鼓励，并支持其出兵桂林。^②然而，就在王育寅发布讨桂电令之后，谭延闿不断加派重兵对王育寅和林修梅进行围剿。孙中山试图介入调停，劝告谭延闿、赵恒惕以大义为先。^③但这一努力未获成功。11月初，谭延闿攻占了大庸和慈利，迫使王育寅率领残余部队撤退至永顺，林修梅则“不知下落”。^④王育寅和林修梅原本计划的出师攻桂行动也未能实施。

结语

在民国初期的反袁斗争与护法运动中，湖南因其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和革命基础，成为斗争最为激烈的地区之一。在革命党人林德轩看来，掌握两湖地区对于革命活动和推广党的政见至关重要，“得之，则他日建设之际，尚可以主张吾党之政见。非然，则滔滔皆是一。袁世凯之本身虽去，而化身无穷，前途非常危险”。^⑤覃振也指出，湖南的革命行动不仅为滇、川提供了屏障，也为民军在鄂、豫地区开辟了通道，促进了更广泛的战略合作，湖南的军事价值比湖北更为重要。^⑥湘西作为湖南与西南各省之间的战略节点，在南北政治势力较量中又有着特殊的地位。对革命党来说，重视湘西，除了其地理位置的战略重要性外，还在于清末民初以来的革命活动利用该地区的武力传统建立了较为深厚的革命基础。

为推动第二次护法运动，孙中山高度重视湘西护法力量，制定了详细战略部署，旨在促使湘西护法力量联合对桂系发起进攻。然而，在南北对峙的背景下，在外部势力的不断渗透挤压下，湘西护法力量内部出现动摇与分裂，削弱了湘西护法力量统一行动的能力。廖湘芸奋力一搏，谋杀了背离革命阵营的周则范，仍无济于大局，反而招致谭延闿的围剿，不得不败出湘西。

孙中山在湘西地区护法战略部署所面临的困境，源于多重交织的因素。首先，孙中山依赖的革命力量，如廖湘芸、林德轩及覃振等，并非湘西地区的主流军事势力，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革命党的实际影响力和行动能力。尽管湘西地区的主要军事首领，如田应诏和张学济，表面上支持孙中山的护法战略，实际上更关注其自身的统治地位和利益。其次，地方势力的不稳定性和军阀间的纷争进一步削弱了孙中山在湘西地区建立稳定革命联盟的基础。地方力量最初可能因为政治和军事支持的需求倾向于孙中山，但随着自身力量的增强，这种依赖关系逐渐减弱。田应诏、张学济和周则范在第一次护法战争中支持孙中山，但后来因个人利益和战略考量改变了立场。王育寅及蔡钜猷对攻桂的表态，也反映了这种基于利益的策略转变。最后，孙中山在对抗根深蒂固的地方势力和军阀集团时，其影响力有限。虽然中华革命党在地方积极推进革命行动，且周则范之死一度为孙中山统一湘西提供了机会，但谭延闿的强势干预导致了廖湘芸的失败，田应诏与张学济的联盟解体，进一步加剧了孙中山在湘西的革命困境，并最终失败。

近代中国南北军阀的纷争与地方势力的盘踞造成了一个极为动荡的政治军事环境，为革命的兴起提供了机遇，也给革命运动的推进制造了很多困局。孙中山在湘西的护法战略未能完全达成预期目标，在某种意义上较为典型地揭示了民国初期利用地方军阀力量推动革命运动的复杂背景与脆弱性。

（责任编辑：许丽梅）

①《湘西各军推林为总司令电》，《顺天时报》1920年10月21日，第3版。

②《复蔡钜猷函》，1920年10月4日前，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352页。

③《致赵恒惕等电》，1920年10月25日，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372—373页。

④《湘西战事之终了》，《申报》1920年11月13日，第7版。

⑤《林德轩上总理函》，1916年4月16日，环龙路档案第04418号。

⑥《覃振等上总理函》，1916年1月18日，环龙路档案第04475号，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馆档案馆藏。